中國知識份子的文明憂思

許紀霖

有人講到刻下中國社會陷入「對抗格局」的不幸，論及中國社會一貫注重「和諧」的特徵，以及歷史而言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和為貴的族群的傳統，並以此反證民主政治之不適應於中國，進而否認中國此刻盡速啟動民主政治進程的必要性。更有人指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因為如果說西方曾經運用「人權」這個概念「把蘇聯搞垮了」，那麼，此時此刻，民主將會是「一根搞垮中國的絞索」①。

有人指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因為如果說西方曾經運用「人權」這個概念「把蘇聯搞垮了」，那麼，民主將會是「一根搞垮中國的絞索」。姑且不論「民主」與「人權」算不算個「好東西」，就蘇聯的垮台而言，因素眾多，哪裏只是西方敵對勢力「打人權牌」的成果？

一 「新」、「老」中國的歷時性差異

姑且不論「民主」與「人權」算不算個「好東西」，是否應為一切正常人類所尊奉，以及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是否一直孜孜奮求這一目標。退一萬步，就蘇聯的垮台而言，因素眾多，牽連廣泛，事涉深層，哪裏只是西方敵對勢力「打人權牌」的成果？事後回瞰，總而言之，其間各種病因交纏糾結，而內政優於外交，政治重於軍事，執政黨的所作所為甚於西方敵對勢力。若說西方的「居心叵測」即可獨立奏效，則不免小覷了蘇共的能力和俄羅斯人的智力。因此，此說指鹿為馬，玩弄白馬非馬，完全忽略蘇聯政體本身的嚴重合法性危機與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危機，根本不顧人心向背的政治正義，屬於刻下中國流行於一部分心智當中的典型「政治左派」言論，錯亂而癲狂，這裏暫且不妨置諸一邊②。就前面一說來看，視其語境，參其內涵，揣摩其命意，似乎流淌自一種文化「鄉愁」理念，而患有敘事文本的歷時性錯亂病症。

的確，昔年梁漱溟先生曾經喟言，「老中國」人際互動講究合作共事，而非時時處處總以「對峙格局」對待他人。由此形成人際格局中「時則彼此顧恤，互相

保障；時則彼此禮讓，力求相安」的「本乎人情」、「反身自求」的倫理取向與禮治秩序，而經由法律規則所編織的法制秩序，被涵容於並表現為所謂的「禮法」秩序，於「官」、「民」兩極的上下結構中，更出諸為「禮俗」這一人世規則，極相慰貼於傳統中國社會的人生與人心。本來，道理極複雜，而事情很簡單，要是一起共事，尚未合作，便已先「三權分立」，擺出一副制衡與對抗的陣勢，說明心無誠意，其來不善，那還怎麼共事呢？更遑論合作了。

實際上，從理想人格典型的預期而言，據梁先生解析，中國傳統上受到崇尚的典型是謙謙君子，這種人格的特質是尊敬他人、佩服他人，而自己恆歉然若不足，在回看反省的「謙」中，精神渾收聚於內而向上，對外則服善推賢之心油然莫能自已。西洋式的政治家到處發演說、拉選票、運動選舉，在舊日中國讀書人眼光中，無論如何，是不能點頭承認的。相反，中國若有選舉，其必由眾人有所尊敬、有所佩服之心，而相率敬請於其人之門而願受教，殆非「我選你為代表」之謂也，或「我幫你忙，投你一票」之謂也。因此，當其時，就解決「中國問題」和「人生問題」而言，梁先生直言，民主屬於一條走不通的路③。

梁漱溟使用「中國傳統上」與「舊日中國讀書人」的表述，語境既是「老中國」，便說明其與「新中國」之間已存嫌隙，以此「和諧共事」否定基於「對峙格局」的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不僅誤解了他的原意和民主政治，也脫離了民主政治確乎是一種現代政治生活方式這一語境。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梁先生的此番陳說，旨在說明「老中國」的情形對於新式政制的羈絆，意在指陳若要新制生效，必先自生活樣態和生活態度的轉型起步，由此丁一卯二，一步一步，向前推展，假以時日，經磨歷劫，為包括民主政治在內的新制鋪墊社會基礎，然後才能指望新制落地生根，漸見成效。貿然從事，但求速成，硬性嫁配，不但事與願違，而且可能適得其反，反會延宕民主落地華夏，乃至於自治未成，先已自亂，民主未來，民狂早到。

梁先生使用「中國傳統上」與「舊日中國讀書人」種種表述，致意再三，說明老先生對此歷時性差異是心知肚明的，決不會因此而無視民主與法治作為新型政統本身的正當性。這也就是為何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自由主義學人紛紛學習《毛選》，心悅誠服地自我改造，而舉世滔滔，雖千萬人，唯見梁漱溟特立獨行，以身作則，絕不人云亦云，而且，愈到晚年，愈見其志，疾呼民主與法治。實際上，通觀梁先生一生，最早迷信立憲，後轉向革命，再堅認憲政不合中國需要，終看穿中國民主、憲政的長期與艱鉅；晚年嚴辨憲政與專政，堅信「毛主席逝世兩年後，法制與民主的呼聲漸起，其前途必逐步展開，無疑也」④，旗幟鮮明地呼喚建立民主、法制與憲政，一生思索不捨，恪盡了一個現代知識公民批判性闡釋的義務與擔當⑤。

梁漱溟

因此，一句話歸總，今天我們需要明白的是，此處的語境，既是「老中國」，便說明其與「新中國」之間已存嫌隙，以此「和諧共事」否定基於「對峙格局」的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不僅誤解了梁先生的原意和民主政治，也脫離了民主政治確乎是一種現代政治生活方式，因而難以「老中國」的情形來擅予褒貶這一根本語境。

君不見，歷經百年更張，尤其晚近三十年的急速市場化進程，今日的中國人，固然依舊注重「和諧」，講究以和為貴，而且，執政當局更是以「和諧社會」自持，並以此召令天下。然而，現代都市化陌生人社會形態本身，不期然間，早已使得「和諧」是以權利義務清清楚楚為前提的，而非單純依據「情義」來定取捨的了。生存當前，大寫的自我早已覺醒，情義總是不敵利益，或者，純屬兩碼事。真所謂「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近思錄》)因而，即便依然講求「和諧」，但是，此種「和諧」其實依恃於「對峙」，是以「對峙」為條件的，並且是「對峙」的結果，在此前提下，進求以理性排遣「對峙」，實現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換言之，它可能成就的是一種基於自我利益立場和權利本位的「合作共事」，一種依據法權程序的攘讓取捨。

處此時代，權利義務清清楚楚，公私分明，一切依循法權程序主義，就是達致和諧的必由之路，也就是和諧本身。和諧是「和」，而不是簡單的「同」，意味着權利義務清清楚楚才是達致中和的人間正道。這既是人心所向，也是沒法子的事。

如果說「舊日中國讀書人」對於政客做秀，「到處發演說、拉選票、運動選舉」不能「點頭承認」，那麼，「今日中國讀書人」，情形丕變，好像咸認非此不足以言正當性，至少，明白不足以馭控「權力的籠頭」呢！說到底，處此時代，權利義務清清楚楚，公私分明，一切依循法權程序主義，就是達致和諧的必由之路，也就是和諧本身。和諧是「和」，而不是簡單的「同」，意味着權利義務清清楚楚才是達致中和的人間正道。這既是人心所向，也是沒法子的事。而就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情形來看，對於今日的中國人來說，這就是面前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希望達致的生活方式，早已不是甚麼海客瀛洲，剩下的不過是如何將此樣態推展於政制罷了。也正是推展不力，一時間人心思動，左右出擊，有以然哉！

二　世俗化時代的政制與政治

還有位先生，來自香港的一間大學，懇切地告誡「內地學者」，不要盡為民主政治評功擺好，民主其實是一種頂頂虛偽的東西，權勢階級的遊戲而已，對於中國其實沒甚麼用，可能，也沒甚麼好處。在他看來，當下中國的政制，已屬極品，何復他求？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民主的一般評議而言，這話講得很實在，在下頗贊成。看看當今民主政制下無恥政客的翻雲覆雨，資本勢力的操盤控馭，小民百姓的娛樂和愚樂，極度的消費主義和商業資本主導下的惡俗世態，大家都會感同身受，心知肚明，不禁慨嘆人世生活與人間秩序的何去何

從。的確，民主，民主，其情其景，如同清末官場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女人所言，「啊唷！不要說起！越是官宦人家，規矩越嚴，內裏頭的笑話越多。」⑥

事實上，當今學人，無論持取何種理論立場和思想進路，但凡心智正常者，只要稍予留意，面對百年中國建設民主政體的曲曲折折，遙觀先民主起來的國族的磕磕碰碰，恐怕也沒有人天真到以為民主政治包治百病，真的相信只要施行民主，則一切「中國問題」均可迎刃而解、萬事大吉。就像所謂「自由貿易」，原是列強的遊戲，可一旦優勢不再，還不是力祭保護主義魂幡，一切以自家利益為轉移，而將那個叫做「國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raison d'état) 的看家寶貝，揮舞得團團轉？我們在這邊廂，哪裏只能不明所以一面倒地頂禮膜拜呢！

的確，民主只是一種政治生活方式，未必能致極善，但卻可防大惡，這原本是常識，好像用不着再作聲明，「香港同胞」與「內地學者」都不缺這一課。問題在於，就中國而言，處此世俗化而非神聖化時代，如今眼目下，早已不再是梁老先生一士諤諤之際，陌生人社會生態已然成型，個體權益觀念煥然覺醒，社會利益主體儼然分層，億萬國民政治參與熱情高漲，其錯綜複雜、紛紜動蕩，構成了基本國情，蔚為天下大勢。而凡此種種，卻找不到出口，嗷嗷待哺，勞問一聲：用甚麼來安頓他們的政治生活？抑或，他們根本不需要擁有自己的政治生活？

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政治成熟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由於低度的政治參與，普遍的無聲狀態，大眾參與遭到排斥，導致缺乏權力制約機制，結果造成權力「私性化」，乃至「準黑化」。

正是在此，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政治成熟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韋伯曾經指斥的「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正在侵蝕着中國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的發育機制。一方面，如何將主要以多元化為特徵的公民社會發育與維護國族利益協調起來，以統一的政治過程即大眾參與的民主來遏制社會多元化造成的離散傾向，藉由政治的主導力量塑造適足以統一國家利益及其個體自由的政治機制，構成了當今中國面臨的急迫課題。另一方面，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由於低度的政治參與，普遍的無聲狀態，大眾參與遭到排斥，導致缺乏權力制約機制，結果造成權力「私性化」，乃至「準黑化」，以利益而非信念為紐結所形成的官僚集團的腐敗成為常態。而這一切問題的解決，單靠發展經濟換取穩定和合法性是不夠的，指責民主不是個好東西，告誡「內地同胞」不要迷信民主，則恐怕恰恰屬於南轅而北轍！

現代社會，無分東西，都是一種世俗化的生活樣態。現代政治，不管是何種政治，民主政治也好，集權政治也罷，乃至於極權政制，也都是一種俗常的常態政治，一種平庸政治。換言之，是一種世俗化政治，別唸經賭咒，也別再裝神弄鬼。世俗化走過了頭，免不了庸俗化，通觀今日的民主政治，歐美與亞非，常常上演此種鬧劇，而飽受詬病，也讓作為細心觀察者的我們，不禁難免

神往而失望。也就因此，面對此情此景，對於人類政制和政治，關於世態與人心，其是非，其善惡，其美醜，讓人愁腸百結、輾轉無路之餘，不免會於失望之際，而生出憎惡來，乃至於生發出絕望來。此時此際，與其說我們看似厭世，毋寧說我們實為嚮往，而對於這個叫做「人」、「人生」與「人世」的存在，心生一縷憂思。朋友，這就是所謂的「知識份子」的特質嘛！讀書人的「沒事找事」嘛！有甚麼不正常的呢？又何必大驚小怪呢？

但是，也恰恰在此，有些分際是必須講清的，否則，天下的事豈不就無是無非了。就此刻民主政治這一話題來講，對於其制度安排局限性的體認，對於其俗常或者庸俗特質的厭惡，不等於為着安頓眼下人世計，為着億萬生民柴米油鹽的生計着想，特別是為了滿足億萬人追求較好的生計這一憧憬而言，人們不應或者不必從各種有害的制度中找出較為不壞的一種。換言之，用民主政制和政治民主來規制權力，安頓人世，護佑民生，尚屬最為不壞的一種選擇。這本為通識，也是許多閣下們已然並且正在享受着的制度之福。要不然，怎麼舉世紛紛，但凡發達富裕之國，都採行此制呢！擇其善而從之，本為向善之心的天然趨向，也是造福國族的職責所在，而且是那個叫做「知識份子」的群體責無旁貸的擔當。對此視若無睹，自甘於外，至少是將對於俗常政治的反感，與閣下心中懷持的那一份文明憂思混為一談了——如果你明白「文明憂思」的基本涵義的話。而以自家的心意裁斷普天之下人的心意，將自家的憂思等同於甚至凌駕於天下之人的心思，那就未免太過「自愛」——如果不說「自私」與「自閉」的話。東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偏偏就不如你清醒，朋友？

用民主政制和政治民主來規制權力，尚屬最為不壞的一種選擇。要不然，怎麼舉世紛紛，但凡發達富裕之國，都採行此制呢！擇其善而從之，是那個叫做「知識份子」的群體責無旁貸的擔當。對此視若無睹，至少是將對於俗常政治的反感與文明憂思混為一談了。

而且，為甚麼你偏偏選擇壞的民主、低端的民主、不成熟的民主或者民主中的惡質部分，作為民主不應行之於中國的例證呢？民主本身的善端，以及普天之下明明有那麼多好的民主、高端的民主和成熟的民主，為甚麼你卻偏偏避而不談呢？這就好比知人論世，說到人的可恥與悲哀，你偏偏盡找頭上長瘡腳底流膿的，而不同時兼顧「雷鋒」式的光明一面，是何道理？以前者言，人如禽獸，人世豈可容身，洒家活着也沒意思；拿後者為例，則人終究是人，人世畢竟美好，人人自當好自為之，包括努力尋找和建設一種較好的和平共處的制度安排。

設若性耽文明憂思，放眼四顧，神馳八極，這人世間不僅可悲、可鄙與可惡，而且，亦非可欲、可信與可能。進而言之，所謂的「文明及其進步」，真的能增進人生的福祉和人類的德性嗎？所謂的「文明和進步」的結果，難道不是使得人性惟危與人心惟微益發惡質化，人世愈益疏離與冷漠，反倒充斥着空寂無邊的荒原之感嗎？面對一己人生的曲折和世間大眾的苦難，可能許多人都會時常感喟，處此大千，生命是沒法子的事，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哪一個人生不是個「苦」字？想想那佛家，一個「苦」字就打發了這世界。順此思路，究極而言，人生是虛妄的，生命是悲劇性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也許，這便是一種文明

憂思了，頂頂真實的文明憂思了。可是，再重申一句，它與對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卻需恰予分際，不可混為一談，本不是甚麼深奧的事情呀。否則，不但民主政治，就連今天的討論，也是多餘的呀，朋友！——不能因為你厭世，也勸別人都自殺吧！

畢竟，生活在此際，徜徉在當下，是每個人的命運，而期盼此際更加美好，才是一切論述的既定條件，也是作為知識份子的勞動分工者，考量包括民主在內的一切人間制度安排時，不可省略的根本前提。拋開這一條件和前提，信馬由韁，那叫詩意和哲思，卻不是打理現實政制最好的運思，更非怡人的心思。對於不得不活在當下，而且是在此一特定的當下，包括你我在內的芸芸眾生來說，自是尋常道理，也是庸常情理，更是繞不過去的法理，不能不正視的真理，何容抵賴呢？!

人生如此，這個叫做「民主」的東西，亦且如此，或者，愈發如此，明擺着的事嘛！

一方面以「民主也不是好東西」來排除中國政制的民主憧憬，另一方面又汲汲於證說當下另有早已超出民主政制的好東西，鼓譟中國政制是古今最好的制度，可就是不想定居於此好東西的轄制之下，這是真的懷持「文明憂思」呢？還是討巧賣乖？

三 「文明憂思」，抑或討巧賣乖

是的，所有的「知識份子」，不管自認為是大知識份子，還是落寞的小知識份子，常常免不了都會油然而生一縷幽思，進而可能會滋長為一種憂思，即對存在本身懷持永恆的焦慮。小資麻麻的幽思與大氣淋漓的憂思，均屬常態的心思，本為人性之常，也是人世之福，可能讀書人較其他勞動者更且為甚。甚麼叫「哲學」，玄乎乎的？還不就是此種永恆的焦慮。身處紛紜亂世或者急促轉型之際，則幽思愈切，憂思愈甚，到頭來，還會迫出佯狂或者自殺甚麼的呢！千古神州，多少哀情；浩瀚世界，不盡怨曲。它們訴說的，就是此種綿綿悲憫，道出的不過是一腔恨愛交加的無奈。由此，對於人生的意義、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欲望，他們常常都會「沒事找事」，心懷此一「永恆的焦慮」。

也就因此，現實中的各種政治制度和社會狀態，在他們看來，都是有缺陷的，永遠是不圓滿的。可能，正是因此之慮，才使得他們於憧憬可欲人生，嚮往理想人世之際，憬然於改良人世的願景，油然而生提澌人生的衝動，甚至為此宵衣旰食，流汗、流淚又流血呢！所謂「不做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正為此大悲憫，正為此大智慧。既表述了「文明憂思」，了然於萬事皆空，又展示了君子人格，對於人生懷莊敬之心，對於人世守謹勤之行。

但是，如前所述，不能因為你閣下厭世，就要求全體國人一同自殺吧！這正像自甘素食，倡言環保，固為一種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好像也是刻下不少城市大小白領的時尚，難容別人置喙，但總不能由此就鄙薄一切雜食動物呀！後者天生地養，何嘗不是不得已呢！換言之，你徜徉於富足之島，不喜歡民主

這個「好東西」，未必一定非要我們大家都厭惡它呀！正像你吃撐了，為何非要飢民一同節食呢？至於一方面以「民主也不是好東西」來排除中國政制的民主憧憬，另一方面，又汲汲於證說當下另有早已超出民主政制的好東西存焉，鼓譟中國政制是古今最好的制度云云，可就是不想定居於此好東西的轄制之下，則你是真的懷持「文明憂思」呢？還是借話說話，指東打西，甚至於討巧賣乖呢？筆者相信，這也不是需要特別甄別才能看得清楚的事情。

當我們考量現實政治安排和人世生活時，都是在世俗歷史中，以世俗的事物和事務為樣本，要求對於它們給予世俗的時間的理解與自我理解。此與「知識份子」的文明憂思，是兩碼事。

推而言之，身處今天這一市場化與世俗化的人世，用自己對於賢王政治和君子之治的緬想，來批判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和不成熟，不僅混淆了時代，至少，迷懵於學科分際，而且，眼見中國社會億萬民眾有口無處申言，此種姿態，也是一種不道德。換言之，當我們考量現實政治安排和人世生活時，包括美國的政治與中國的政治、美國的社會與中國的社會，都是在世俗歷史中，以世俗的事物和事務為樣本，要求對於它們給予世俗的時間的理解與自我理解。此與「知識份子」的文明憂思，是兩碼事。否則，真的就叫不着邊際了。

註釋

① 河清教授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學術研討會」上的即席發言，參見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380、346-49；河清：〈中國文化不容多黨制，集權為民是正道〉，載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2008年12月21日），頁394-425。甘陽研究員的發言，參見《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頁252-56、273-78。

② 實際上，現任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Gennady A. Zyuganov）即曾喟言，蘇共執政時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和壟斷真理，導致社會和精神的全面窒息，使得民眾與政權嚴重對抗，加上貪瀆橫行，對外黷武，出兵阿富汗，諸力合一，才壓垮了蘇聯這匹駱駝。而且，即便西方「打人權牌」，那也是因為蘇聯的確存在嚴重侵犯人權的種種惡行，才使得對方有可能利用這一概念發起攻擊，以致民心盡失，最後轟然坍塌。參見秀中國社區，www.showchina.net.cn/bbs/viewthread.php?tid=191774。另參見李開盛：〈中國必須避開「勃列日涅夫陷阱」〉（2010年3月18日），中國選舉與治理網，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1889。

③ 以上參見梁漱溟：〈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載《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51。

④ 梁漱溟：〈毛主席對於法律作如是觀〉，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頁430。

⑤ 參見許章潤：《說法　活法　立法——關於法律之為一種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159。

⑥ 參見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824。

許章潤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